



李泽厚

李泽厚对话集 与刘再复对话

两个思想家的碰撞更见思想，

落基山下，所谈、所思、所念的是中国。

这不仅仅是文学、美学、哲学、历史的纵横对话，

更是一场思想的盛宴！

如果思想之光，能够照亮你的心田，
那么你将永远充满智慧和希望！

中华书局

李泽厚对话集
与刘再复对话

李泽厚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泽厚对话集. 与刘再复对话/李泽厚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4.9

ISBN 978-7-101-10324-3

I. 李… II. 李…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2775 号

-
- | | |
|------|---|
| 书 名 | 李泽厚对话集·与刘再复对话 |
| 著 者 | 李泽厚 |
| 责任编辑 | 孙永娟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30 千字 |
| 印 数 | 1-6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0324-3 |
| 定 价 | 42.00 元 |
-



1996 年 4 月，李泽厚与刘再复在犹他州旅游时留影。

1993年6月，李泽厚参加刘再复、罗多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后排从右至左为：汪晖、金观涛、刘青峰、陈方正、刘再复、李泽厚、北岛、李欧梵、高建平、陈菲亚、高行健；前排从右至左为：李明、刘禾、刘莲。除照片中人外，还有余英时、林毓生、张灏、甘阳、刘小枫、李陀、王元化、朱维铮、林道群、张志扬等人。



1997年李泽厚与北岛、刘小枫、甘阳、林道群、罗多弼（从右至左）在瑞典。



2000 年，刘再复观看李泽厚中学时代的作文本（已毁）。

2000 年 6 月，仅刘再复、陈菲亚夫妇在李泽厚博尔德 (Boulder) 家中“祝寿”，李说：“人生七十今不稀，依旧顽童一个。”



2002 年，李泽厚与刘再复、郑培凯和许倬云（从右至左）在香港城市大学。



2011 年，李泽厚与刘再复参观离家 40 余公里的丹佛市孙中山在 1911 年辛亥革命时居住的旅馆房间。

序

承中华书局雅意，得此合编《对话集》。说明三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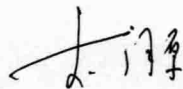
一、均系发表过的答问、访谈、对话，未加改动。标题为原编者所拟，亦不变更。

二、《与刘再复对谈》，未能全部收入，收入者亦多删削，原因“你懂的”。同此，各卷被删削处不再恢复。

三、《哲学登场》两本合为一册，《附录》略有迁移增补。

覆瓿旧谈，居然再现，重复唠叨，应属可厌；耄耋之年，无力再练，留此印痕，或为记念？

谢谢编辑申作宏先生。



2014年3月于科州博城

《李泽厚对话集》

李泽厚 著

《李泽厚对话集·八十年代》

《李泽厚对话集·九十年代》

《李泽厚对话集·廿一世纪（一）》

《李泽厚对话集·廿一世纪（二）》

《李泽厚对话集·浮生论学》

《李泽厚对话集·与刘再复对谈》

《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

目 录

文学与艺术的情思 (1988)	1
历史行程的二律背反 (1992)	11
危机压顶的浮躁文化 (1994)	18
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浮沉 (1994)	28
神化魔化,殊途同归 (1995)	39
中国是充满潜力的 (1995)	45
一体与多元 (1995)	56
文学政治一元论批判 (1995)	71
主义与常识 (1995)	83
主体论学案的回顾 (1995)	94
世纪之交的哲学展望 (1996)	104
康有为评说 (1996)	114
孙中山评说 (1996)	120
文学对“知识—权力”结构的拒绝 (1996)	127
理念与情爱的冲突 (1996)	134
中国现代诸作家评论 (1996)	151
哲学智慧和艺术感觉 (1996)	161
适应与反抗 (1996)	175
教育的重心是培养人的心理本体 (1996)	191
法治的理想和现实 (1997)	197

群体情绪与个体情感 (1998)	203
鲁迅与胡适比较 (2001)	207
21 世纪应把人文教育作为教育的重心 (2004)	214
走出语言学世纪 (2006)	222
关于存在的“最后家园” (2006)	228
老庄哲学与海德格尔的根本区别 (2006)	234
对沟口雄三亚洲表述的质疑 (2006)	241
反“反二分法”与“后现代主义” (2006)	248
共鉴五四新文化 (2009)	253
附录：一字之差的说明	264
提倡一个并不清楚的东西是危险的 (2009)	268
与刘再复的美学对话录 (2009)	279
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 (2010)	299

文学与艺术的情思

刘再复（下简称“刘”）：好久不见了，朋友们都很想念你，去年春节你远走高飞的时候，曾嘱托我要告诉年轻的朋友们：“我会回来的。”我已经完成了任务。

李泽厚（下简称“李”）：我也很想念朋友们。很奇怪，妻子、孩子都和我走了，就在身边，但还是感到孤独，很想念国内的朋友。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感情上讲，应该是对的。那里的关系总和代替不了这里的关系总和。

刘：我们的民族儿女，多数是土地的崇拜者，不管走到哪里总是想着祖国，总有一种奇怪的“恋母情结”，这可能与民族文化心理有关。

李：你最近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谈话，我已经读过了，我支持你。你还是客气，对《李自成》的第一卷还有肯定。前年底，我在《福建论坛》发表的一个谈话中，就支持你提出的一些文学观念，可惜去年在这个刊物的一月号发表的时候，他们把这一节删掉了。

刘：我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即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常常突破原来的设想。因为一旦进行创作，作家笔下的人物就有独立活动的权利，这种人物将按照自

己的性格逻辑和情感逻辑发展，作家常常不得不尊重他们的逻辑而改变自己的安排。而且，作家在创作之前的设想，一般都停留在意识层次活动，而进入创作之后，他们往往要调动全身心的情感，此时，处于潜意识层的东西也参与了创作过程，并会改变原来意识到的部分。如果一切都事先“精心设计”好了，就不可能进入创作的自由状态。不知道你是否赞成这个观点？

李：在新加坡期间，我在接受《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也谈过这个问题。我回答说，要艺术家在创作之前事先决定要表现何种思想是不可能的。文学创作在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这要经过大量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素养的积累，然后喷发出来，许多古典文学作品的产生都说明了这点，因此，要作家事先想好一个主题才写，不符合创作的规律。

刘：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正是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一个课题。就像探讨诗歌创作中的通感、变形、意象、佻谬语言等等，完全是应当的。这种探讨与文学要不要关心社会、关心政治不是一回事，也决不意味着蔑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自然、文学与政治等外部关系问题的探讨，即文学的外部规律的探讨。

李：连这种问题的探讨也不允许，还有什么文学理论！所以我一直劝作家多读各种各样的书，但千万不要读“文学理论”。

刘：我能理解你的激愤之辞。如果我的文学理论扼杀作家的灵性和个性创造力，我宁愿他们坚决抛弃，不要浪费生命。

李：你最近还发表了什么文章？

刘：我最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近十年的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对新时期文学作了第二次概述。文

章一开始，就请了你这位美学“尊神”来吓唬人，我说你多次肯定了新时期文学。

李：是的，我一点也不含糊。

刘：新时期文学是充满变革精神的，而且与世界文化思潮相呼应，它寻求人类文化前进的轨迹，寻求与世界文化的同构点，这其实是很好的现象。在我的印象中，你对舒婷、北岛这一年轻诗群给予很热情的评价。

李：是的，我称这些年轻诗群为新文学的一只春燕。舒婷的诗表现当时青年一代真实的苦闷和追求，有诗味。诗不必求多，每一个诗人能留下几首让我们乐于传颂的诗就够了。

刘：舒婷的诗，在新时期文学萌芽时期，适应了时代的审美趋向，把当时一代青年的感受诗化地表现出来。她的诗还带有伤感的美。

李：这种伤感的内涵是现代的，但形式则有点古典味。

刘：他们不承认自己的诗是朦胧诗，但他们的诗确实表现年轻诗人们一种朦胧的苦闷和朦胧的愿望。他们的诗，象征性很强，意象的内涵也较丰富。还有一些老诗人和中年诗人，他们这10年中的诗写得非常好，你可能不太注意。今天，我倒是希望同你谈谈新时期文学的不足之处，或者说，谈谈你对新时期文学的期待。

李：我希望我们的作家气魄能更大一点，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作品，不要急功近利。真正成功的作品，真正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现在发表或者若干年以后发表都一样。这样，就不会为了发表，而迁就一时的社会文化气氛，违心地修改自己的作品，甚至动摇原来气魄雄大的构思。

刘：现在确实少有面壁十年进行潜心创作的作家。

李：既然献身于文学，还经不住一时名利的诱惑吗？要决心写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不怕埋没的。不要急，不要迁就，不要迁就一时的政策，不要迁就各种气候。像卡夫卡的作品，甚至是死后才被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日瓦戈医生》，不是也在帕斯捷尔纳克死后才在苏联发表吗？但历史给了他们以公正的评价。

刘：卡夫卡是真正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他对文学事业极其真诚。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内在气魄很大。为了文学事业，他牺牲了健康，牺牲了爱情，牺牲了许多人生的欢乐。他的内心有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他以坚韧的意志力量抗拒悲剧式的命运和悲剧式的环境。他认为可忧虑的社会是难以驾驭的，但每个人的自身是可驾驭的，自己可以决定自己。他正是以这种非凡的内在气魄，献身于他所选择的事业，他是另一种意义的英雄。

李：献身于文学事业，就是要对文学无比真诚，果戈理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的时候，就毅然烧掉自己的手稿。这就是真诚。一个真诚的作家，只对人民负责，只对历史负责。

刘：真诚，对于作家是绝对重要的。

李：离开一段时间，对国内文艺界的情况又有些隔膜，你能给我讲讲最近文艺创作的发展情况吗？

刘：你走了一年多，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报告文学热”，报告文学作品十分畅销，最近《当代》杂志发表了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之后，又印了10万册单行本，一售而空，在这之前，钱钢写的《唐山大地震》、苏晓康所写的《洪荒启示录》、《神圣忧思录》、《阴阳大裂变》等，都吸引了大量的读者。

李：这是很好的现象。他们的报告文学有些什么特点呢？

刘：他们已经打破了刘宾雁的创作模式。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作品，主要还是写一个人，一个事件，而这些新秀，则写一个宏观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如人口爆炸问题、婚姻问题、教育危机问题、同居者问题、人才外流问题。

李：除了注意宏观的之外，还要注意微观，报告文学一定要真实，如果报告文学不真实，就失去自身的价值。为什么读者对报告文学会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呢？

刘：我想，这是因为读者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关心自己身处的社会。这几年我们的社会情况变化得非常急速，身处社会的人反而不认识自己的社会，因此，他们想了解社会的真相、社会的全景，报告文学正好满足读者的这种心理需求。从报告文学的作家来说，这一群后起之秀，对社会格外关心。他们也有我国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有点忧患意识，总是喜欢用自己独特的忧思和期待的情思去关怀社会。

李：我很赞赏他们的这种精神，文学应当关心社会，尤其是中国的文学家。我认为世界上第一流的作家，例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卡夫卡，他们都是深刻地关怀社会的作家，都是把自己的作品与时代最根本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社会最焦虑的问题也是他们最焦虑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作家是有很好的传统的。躲到“象牙塔”里，历来为中国作家所不齿。

刘：我赞成你的观点。在中国，作家是应当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在美国，一个作家或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整天嚷着责任感、使命感，可能有些可笑，但在中国，作为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如果不讲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样也可笑。

李：不仅可笑，甚至可悲。

刘：美国是一个历史很短的国家，只有200年的历史，而且他们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他们的知识分子虽然也关怀社会，但需要作家去忧虑的问题毕竟要比我们少，而我们则不然，我们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传统的包袱那么沉重，现在的社会问题那么多，不讲责任感，恐怕是不行的。

李：中国还那么苦，如果作家什么也不管，忘记自己的责任，对人间的痛苦无动于衷，就缺乏作家的良知。

刘：这几年我喜欢讲良知。其实正是使命感。我在天津的一次讲演中，曾对文学动力问题发表过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弗洛伊德把“性压抑”作为文学的“动力源”，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而大部分作家的动力源则是良知压抑，这尤其是中国文学普遍的动力源。我记得你在美学论文中多次地讲到，文学艺术不等于审美，文学也有非审美的部分。非审美的部分，可能就是社会责任感这一些了。这种责任感，也是你猜想的审美的复杂方程式的一个要素吧。

李：可以这么说，我一直不赞成把文学变成纯艺术，我主张文学多元化，尊重种种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文学的并存和竞争。纯文学也应当自由地发展，但我还是更喜欢反映社会忧思的作品。这种作品对我们来说，还是太少了。年轻的朋友都说写这种作品的作家很痛苦，但我“欣赏”这种痛苦。一个真诚的作家，对于社会的痛苦决不会无动于衷，这些痛苦应当在他们的心灵上引起不安，如果他们对人间的痛苦彻底冷漠，我想，他们的作品是很难真正感动人的。

刘：近两年来出现的报告文学作品，所以感动人，正是他们抓住了时代的痛苦点，社会的焦虑点。

李：报告文学四个字，重点应当是“报告”这两个字，